

平台经济中的劳动秩序与主体性彰显

在数字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外卖骑手成为现代社会最鲜明的劳动符号。陈龙的《数字疾驶：外卖骑手与平台经济的劳动秩序》解构了数字技术对劳动秩序的重塑逻辑，揭示了算法权力与劳动者主体性之间的复杂关系与博弈。这部扎根于丰富的田野民族志研究不仅增加了劳动社会学在平台经济领域的案例和理论，更以骑手群体的生存境遇为镜像折射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关系的深刻变化。

以算法建构劳动秩序：数字泰勒主义的劳动规训。陈龙的研究揭示出算法系统如何通过精密的数据控制将传统工厂的流水线规训移植到流动的都市空间。对平台“智能调度系统”的解剖揭示了平台企业将劳动者转化为“数据节点”，骑手的骑行路径、送达时长、客户评分等皆被实时量化，形成动态更新的“数字绩效档案”。这种“全景敞视监控”的数字化和不断升级使劳动控制从物理空间转向虚拟数据空间，劳动者在算法的“柔性暴力”下陷入自我规训的循环。

具有创新意义的是，研究提出了“时间殖民”的概念，平台通过压缩配送时间，将时间转化为看不见的控制工具。骑手为争取每单3分钟的弹性时间，不得不在逆行、闯红灯等风险行为与系统惩罚之间进行策略性权衡。这种时间政治的运作机制，暴露出数字技术以效率之名重构劳动伦理，将人的生命价值异化为可计算的时间单位。

脆弱同盟：平台化劳动者团结。面对算法权力的结构性压制，陈龙的研究并未将骑手简化为被动的技术附庸，而是敏锐地捕捉到劳动者在制度缝隙中的创造性抵抗。研究记录的“虚拟驿站”现象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骑手通过自建微信群共享超时订单信息，利用集体智慧破解算法的“困单分配”策略。这些劳动者的微观实践表明，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不会被技术消解，反而在技术异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新型团结形态。

陈龙的研究也清醒地看到劳动者群体抵抗的脆弱性。平台企业通过“游戏化激励”，如冲单奖励、等级勋章分化劳动者群体，将阶级矛盾转化为骑手间的内部竞争。当算法系统升级引入“动态基线算法”时，骑手精心摸索的接单策略瞬间失效，展示了技术权力对草根智慧的碾压性优势。这种“抵抗—收编—再抵抗”的循环或许是数字劳动之劳资斗争的复杂图景和一种不断生成的变动过程。

制度悬置：平台经济的治理悖论。陈龙的研究突破了单纯的技术批判视角，将问题引向更深层的制度分析。平台企业通过“去雇主化”策略，即通过众包模式、个体工商户注册等方式，成功规避《劳动法》的适用范畴，制造出600万名骑手“有劳动无关系”的合法性困境。政府监管部门在“促进创新”与“保障权益”之间的选择导致了劳动保障政策长期停留在“指导意见”层面，形成制度性空白和各种妥协式说辞。

平台资本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一些城市默许企业将骑手社保成本转嫁给社会公共财政。这种“算法红利私人化，社会成本公共化”的分配模式，暴露出数字资本主义对传统福利国家的侵蚀效应。当外卖平台将骑手事故理赔包装成“商业保险创新”时，实质是将人的生命安全纳入风险投资的计算公式。

理论追求：数字劳动研究的范式变化。在方法论层面，陈龙可能开创了一种“算法民族志”的研究范式。他通过深度进入骑手社群，即亲自注册为众包骑手，以骑手身份获取配送App后台数据权限，实现“从界面到代码”的全链条技术解构。这种将数字痕迹分析与参与式观察相结合的方法，为平台经济研究的劳动研究提供了可复制的研究路径。

理论上，陈龙提出“数字劳动体制”的分析框架，将技术控制、资本策略、制度环境、主体实践纳入解释系统。这一理论框架更强调中国语境下平台经济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在于：城乡二元结构为骑手群体作为弹性劳动力，有着不断的可提供的蓄水池；户籍制度加剧了社会保障的制度性排斥。这些独特的结构性因素与算法权力相交织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剥削形态。

未竟之路：数字时代的劳动伦理与人本之思。陈龙的研究直指数字文明的核心矛盾：当技术演进速度超越制度调适能力时，人类社会如何守护劳动者的尊严？研究提出的“算法社会责任”的框架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即如何将劳动者生理极限作为参数纳入算法设计，建立平台数据与国家社保系统的对接机制，这些构想为数字时代的劳动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研究尚有诸多待讨论的议题：骑手群体内部社会网络形成的权力关系、平台经济全球化中的劳动标准博弈、大数据对劳动关系的颠覆性影响等。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学术创新，更在于让那些被算法遮蔽的面孔重新进入公共视域，唤起对数字文明底层逻辑的集体反思。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佟新教授 供稿）